

与会嘉宾热烈讨论伟大企业的成长路径——

企业如何实现从“大”到“伟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论坛视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已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企业500强榜单上，不断出现中国企业新面孔。

不过，世界500强只是按照销售收入排列的一个榜单，实际上只是“500大”。规模大重要还是创造价值更重要？什么样的企业才能称为“伟大”？如何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在博鳌亚洲论坛9日举行的主题为《从“大”到“伟大”：企业的蜕变》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此热烈讨论。

伟大企业啥样

“伟大的企业，首先，要有盈利能力。其次，对社会的贡献大。第三，能够作出规范，处理好与政府、普通老百姓、员工的关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说，在某一特定领域和范畴内，伟大的企业还能通过创造新的科技，引领行业发展，或者解决环保问题，或者解决贫困问题。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认为，要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必须具备六大素质：第一，要有世界眼光，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第二，要有企业家精神，包括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第三，企业结构科学合理；第四，要有文化自信；第五，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第六，还要有利润，“没有利润，员

工富不起来，企业也办不下去”。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表示，伟大的企业首先要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同时还必须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仅仅是产品创新，还包括企业管理形式和治理方式的创新，以及同周边社区关系的创新发展。此外，还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变。

与会嘉宾认为，只有把盈利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创造出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谁是伟大企业

“你心目中哪家公司才是伟大的公司？”面对主持人的提问，袁仁国谦虚地表示，“作为茅台董事长不好说自己现在就是，但茅台离这个目标已越来越远，这些年不仅企业发展越来越好，从2001年到现在，不仅为股东分红超过500亿元，而且在积极履行责任方面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直截了当地指出，迪士尼就是一家伟大的企业。理由在于，“通过不断改变和引领经营模式，从一个卡通人物变成全球文化娱乐领先企业”。

“伟大企业不是自封的，需要时间检验和社会来评判。”令刘永好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特别是近年来，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一个超越一个走在业界前列，“像华为、美的，目前已接近世界伟大企业”。刘永好表示，这些企业规模大，而且创新能力强，“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企业感到骄傲，而且中国还可以孕育更多这样的企业”。

怎样变得伟大

“产品在不断迭代，企业之间也存在迭代。”普罗迪认为，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变得伟大，关键要积极拥抱新技术，要以开放的心态，应对变化，使自己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如果你不能够持续进步，你只是关注国内市场，不走向世界，也不会特别伟大”。

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公司想成为全球性的公司，一定要来中国，中国的改革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司想要更加现代化，那他们当然也必须要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活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伟大”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刘永好说：“我非常荣幸和我的企业参与了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最基础做起，一路摸爬滚打，困难、失败、痛苦，不断磨砺我们奋进，也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与奋进中，我们积



转型发展



博鳌随想

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一国的发展离不开商，官商交往必不可少。如何建立良好的官商关系？怎样的政商关系才算既“亲”又“清”？来自华人圈的政产学代表就此在博鳌论坛上一起碰撞思想的火花。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如今则有人用此形容政商关系，认为政商联盟是人类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权力就像一把火，企业家离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又会被烧伤”。还有观点认为，如果政商之间走得近则会勾肩搭背，如果走得远则会相忘于江湖。

不可否认，人情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亲”的东西无可置疑。亚洲经济多年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人情关系，政商之间的良好关系促进了亚洲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但过密的政商关系则过犹不及，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任何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应该是“亲”和“清”，但包括欧美国家在内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亲”和“清”。西方国家政要出访，往往有大量的企业家随行，这体现的是“亲”；但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竞选时所用大量经费需要筹款，夹杂利益关系，容易导致政企关系不“清”。

新加坡被认为是政商关系处理得较好的一个典型。世界银行将其列为最容易做生意的地方。新加坡的经验是：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律养廉，使人不敢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新加坡通商中国主席、前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李舜贤指出，在新加坡经商“不用找任何人，不用找任何关系”，这显得很“清”；另一方面，从“亲”的角度来说，“政府和企业很愿意相互接触，双方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廖晓洪表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服务要依法依规，要对企业和社会都有利。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在加强政企互动的同时要突出“清”的重要性，强调透明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所有的法制和条例都应透明。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离不开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个健康的政商关系是企业愿意接近官员，官员也愿意聆听企业的心声，但个人关系清清楚楚，形成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的互动局面，两者既“亲密”又“清白”。商人在商言商，官员有权不任性，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康的政商关系已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健康政商关系是发展核心竞争力

徐惠喜

推动经济一体化 提升亚洲竞争力

——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高端访谈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如何通过开放创新提升亚洲的竞争力？亚洲未来发展走势如何？中国将在亚洲经济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记者：由全球贸易复苏和中国强劲增长带动的亚洲经济回暖，具有多大的可持续性？阻碍亚洲经济好趋势头的风险有哪些？

王军：从去年开始，全球经济出现了同步复苏，带动了亚洲经济回暖，亚洲本身也是全球复苏的重要贡献者。从中国前2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来看，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和人为干预，2018年亚洲经济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回暖态势。

近期亚洲经济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呈现升级态势。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必然会带来外溢效应，可能会导致全球需求减弱，全球投资更趋保守。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外溢效应都会给亚洲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同时，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值得注意。最近美股在创下历史新高后出现了明显下跌，而且呈现巨幅震荡态势。对于美国科技股是否存在泡沫，以及泡沫一旦破灭会对全球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币值稳定带来何种影响，现在还很难预料。在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和调整也会影响经济的

稳定运行，进而对亚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记者：亚洲未来将走向何方？亚洲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有哪些？

王军：亚洲发展既受外部环境制约，也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情况下，亚洲从全球化获得的红利减少，外部发展环境不利。从国家内部来看，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亚洲经济在未来还有艰难的路要走，短期内很难有彻底改变。

至于转型升级，大多数经济体并没有找到适合本国的转型升级路径。此外，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还未完成，基本的、健全的工业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亚洲国家多属于资源供应国家，其产业结构多以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无法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跃升机会。在人口结构上，亚洲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收入提高缓慢，消费很难成为主要的拉动力量，这些都是造成转型升级困难的重要原因。

基于这样的现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改善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使亚洲经济能够从根本上有有所改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本质上也是希望亚洲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目标。

记者：中国在亚洲经济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军：首先，中国在亚洲经济格局

中是一个主要引擎，同时也是一股稳定的力量。亚洲经济能有现在的表现，与中国在其中的担当和责任是分不开的。此外，在亚洲内部，不同的经济体由于体量不同、贡献不同，话语权也不同，现有的体系可能存在很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在这方面，中国扮演着亚洲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中国一直倡导自由贸易，鼓励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活跃亚洲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中国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任务之一，通过自身的努力，消除7000万左右人口的贫困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推动亚洲的包容性发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亚洲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做法也是非常好的实践。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等方面，中国也是积极的贡献者。可以说，中国在亚洲经济格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正面的贡献者和推动者。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说说而已

本报记者 牛瑾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脑力激荡，从一场早餐会开始。这场SK早餐会聚集了多位重量级嘉宾，探讨的是“变革新时代，企业新使命”这一话题。

“今天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独特的机遇。要想战胜挑战、拥抱机遇，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靠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其中，各国企业的作为很关键。”

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看来，这个变革的新时代不能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力量。“1978年到2017年之间，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率、14.8%的贸易增长率，是中国发展和开放了不起的成就。中国正走上一条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新的道路。我坚信，中国在未来10年中能够保持6%的年均GDP增长率。”林毅夫说。

变革的新时代，企业

如何履行新使命？SK集团会长崔泰源认为，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履行好社会责任。他表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是说说而已，必须实实在在地做出来。“SK集团正在大力扶持社会型企业，为其提供大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培训，帮助其实现自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表示，“盈利对企业来说很重要，企业要解决和投资者有关的问题，也要解决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关注的问题。在创新和变革的同时，必须考虑企业行为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政商关系的‘亲’与‘清’”分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
本报记者 高齐贵摄